中国现代思想家的认识论由来

蔡志栋

早在 1906 年，严复便明确提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的观点，石破天惊，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对此视而不见。通过重审严复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以及实证主义在中国的浪漫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作重新的评估。

所谓认识论，我们指的是人们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其中涉及主客关系、知行关系、认识的内在环节和机制、认识能力以及真理的如何获得等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和真理相去较远，但是，我们认为它们正是将认识论问题细化之后的产物。我们将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讨论认识论的过程中，如何援引、批评先秦诸子来表达其思想，从一个角度显示先秦诸子对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塑造作用。这种型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越过天理观念，确立现代的真理思想。

“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端概知。……用之时焉。”

康有为

梁启超

认识自由的起点是实践，认识自由绝非要求你认识全天下所有事

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基本品格：“科学之中，大有感情”

处于新旧之交的康有为一方面以孔子之学说为基本圭臬，另一方面又试图引进现代西方的认识论、方法论成果，发展中国传统思想，后者尤以公理化方法为主，但又不限于此。于是，在康有为身上，我们看到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而色彩斑斓的面貌。

知行关系是认识论中的一个基本关系，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探索认识论的逻辑起点。康有为通过诠释孔子，认为“道必先知而后行”，理性、规范可以指导行动，使得行动获得成功。他说：“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

由此，康有为进一步明确提出“士以智为先”，他也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主张公理化的方法。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是先验主义。事实上，几乎和严复同时，康有为主张认识外在世界，抛弃传统的以古典文本和内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路向。他明确提出“夫人之智从万物出者大，从人出者小。圣人之师，万物也”。而且，他也认为，根据先秦儒家的观点，真理是有条件的：“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端概知。……用之时焉。”他明确说：“与时俱变而各有宜。”这些观点动摇了天理的绝对性。

相对而言，新民子梁启超则超越了儒家的苑囿，视野更加广阔。他充分结合先秦文献，从认识对象、认识的基本过程、认识论的环节和认识能力等方面入手，全面地讨论了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整个认识过程，梁启超结合《诗经》，将认识对象区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从这个基本区分出发，他批评了先秦法家在历史观上的命定论态度，突出了历史领域人的自主意志的积极作用。梁启超还认为，认识论的起点是实践，他高度赞赏清代颜李学派的“因行得知”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真理问题上梁启超也严厉地批评了朱熹的真理观，主张回归孔孟的真理论。梁启超认为，真理也即认识论的获得不以知天下之事无巨细为前提，而以认识主体自身特长之所在为转移。换而言之，即便在某一领域获得正确的认识，也可谓“得道”。认识论绝非要求你认识全天下所有事。一定程度上可谓提出了“这一个真理”的观点。

在认识的环节上，梁启超结合先秦诸子，尤其是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墨学，对科学方法论的内在环节、演绎法和归纳法、假设和验证、以及群己之辩等，均有所涉及。对于认识能力，梁启超除了对于一般的理性、经验等表示其观点之外，还讨论了直觉、判断力等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

有着近代“西学第一人”

（下转 6 版）

（上接 4 版）

位富有原创性和洞见的哲人，透过英译的《论语》，在自然而然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和解读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之下，他还是捕捉到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即内化了的“礼”所造就的君子人格。当然，从中国传统学者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看到“礼”背后的“仁”。只有以“仁”为基础，“礼”才不会沦为“虚文”。孔子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反问，正是要表达这一层意思。当初中国学人如刘述先先生等人担心，包括芬格莱特先生在内许多西方学者对于“礼”的强调，不免存在一种“礼俗主义”（ritualism）的危险，缘由也在于此。不过，芬格莱特先生虽然未必能对“仁”应作为“礼”的根基这一点有足够的认同和肯定，却也清楚地了解，日常生活中“礼”的施行不能只是一种机械的肢体操作。他将孔子比喻为音乐大师，将其与那些只会按照乐谱来演习的平庸之辈区别开来，正是对于这一点有着充分的意识。

除了翻译《孔子——即凡而圣》的因缘之外，我和芬格莱特先生还有其他的交流。记得《孔子——即凡而圣》中译本出版之后，他曾经寄赠了一本新出不久的《死亡：哲学的探测》给我，扉页上有他的亲笔签名。我后来应邀为艾文贺（P. J. Ivanhoe）和 Amy Olberding 合编的《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死亡》（*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UNY，2011）一书撰写专章“Death as the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讨论宋明理学尤其阳明学对于“死亡”问题的看法，虽然是基于理学传统的各种原始文献并从其内在理路展开论述，但如今回想起来，阅读芬格莱特先生所赠这本著作的经验，对于那一章的写作恐怕无形中也有助益。也正是因此，我也曾专门将那一章寄给他。我第一封邮件（2010 年 8 月 27 日）忘了将文章附上，结果，他在第二天（2010 年 8 月 29 日）给我的回邮中特别用大写的字体写道：“YOUR NEW ESSAY WOULD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ME, BUT UNFORTUNATELY I COULD NOT FIND ANY ATTACHMENT TO YOUR LETTER. I LOOKED VERY CAREFULLY, BUT THERE WAS CERTAINLY NO ATTACHMENT. PLEASE SEND THE ESSAY TO ME.”此例足可见老先生的认真。

《孔子——即凡而圣》中译出版之后，我当然以为出版社会给芬格莱特先生寄去两本作为纪念，但不知为何他最初一直没有收到，以至于曾专门来信询问。老先生信写得很客气，意思是他没有中译本，如果方便，请我代劳，他可以自己买两本。可惜一定年代之前的邮件，邮箱系统不再保留，这封邮件如今已经无存了。后来我联系出版社的编辑，告知此事，才得到两本给他寄去。因为芬格莱特先生这本《孔子》中译本的缘由，2007 年姜新艳教授编辑《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一书时，曾邀我翻译芬格莱特先生的“Getting Rights Right”一文。但因我当时正有哈佛之行，便邀请当时尚在清华读研究生的陈浩担纲译事，由我负责译文的校读和修订。我在 2007 年 7 月 28 日给芬格莱特先生的邮件中，汇集了校读时遇到的一应问题，尤其是原文注释中一些问题，他在 7 月 31 日即回邮给我，一一详细答复。这件事情，也同样可以为老先生的一丝不苟提供例证。

我与芬格莱特先生的交往并不密切，最近的一次通邮已经是在 2012 年的 1 月 2 日了，那是一封新年互致问候的通信。因为他一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执教（1948—1988），所以我印象中他也一直居住在圣芭芭拉。但是，收到他在柏克利去世的消息，我检索以往他和我的通邮，才发现他曾经在 2010 年 8 月 30 日给我的邮件中提到他的地址，那已经是柏克利了。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十分的遗憾。如果不是我错觉他一直住在圣芭芭拉，去年 4 月我应齐思敏（Mark A. Csikszentmihalyi）教授之邀赴会柏克利时，虽然只有短短数日，我应该可以找个时间专程去看望他。因为我以往始终都是在电子的世界里和他往来，素未一睹老先生的容颜。这个遗憾，如今也只能还诸天地了。不过，我之前见过老先生的照片。与其友生笔下用来描述他的若干词汇如 mild-mannered、uncommonly kind、gentlemanly 以及 soft-spoken 相对照，真是若合符节，足以印证“相由心生”这一观念。中国思想传统中“温其如玉”、“有道气象”一类用来描绘“君子”形象的词语，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芬格莱特先生的容颜留给我的观感。

据悉，芬格莱特先生 2007 年即由圣芭芭拉移居柏克利，住在家人附近。2011 年太太去世之后，芬格莱特先生即由女儿和女婿一家照料生活。临终之前，老先生由家人环绕，也可谓尽享天伦了。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再次浮上芬格莱特先生的面容。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